

代 序

——郭嵩焘生平与思想研讨会开幕词

王晓天

郭嵩焘，湖南湘阴人。生于 1818 年，卒于 1891 年。他是近代中国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和思想家。他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的时代。对内，面临着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对外，面临着中华民族与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之间的矛盾。郭嵩焘的生平事业，是与这两对矛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一生在政治上主要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一件是积极鼓吹向西方学习，并且成为中国第一位派驻西方国家的钦差大臣。

郭嵩焘在国内的官场生涯，基本上是与太平军起义运动相终始的。当太平军攻入湖南时，是他先后动员左宗棠、曾国藩出山。当湘军组成之后，他又提出了组建水师、开征厘捐的建议，使湘军不仅在军事上与太平军周旋更加灵活，而且在军饷上无后顾之忧，因而成为湘军的高参。此后，他在国内的任职，主要也是为湘军筹饷；并且是在他署理广东巡抚期间，与左宗棠配合，消灭了太平军的余部。对于郭嵩焘在政治上办的这件“大事”，我们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当然不能肯定；但是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有很多问题还是值得进行探讨的。

郭嵩焘又是中国最早倡导向西方学习的先行者之一。早在鸦片战争期间，他就曾在浙江亲自参与抗英斗争；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他又在天津亲自参与海防事宜。通过这些事件使他认识到，“西洋之人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即中国与西方国家打交道是不

可避免的客观历史趋势。因此,他不仅利用一切机会,虚心了解和体察西方情势,而且通过对现实和历史经验的研究,认真总结“驭夷之道”。到了 19 世纪 70 年代,他成了朝野公认的最“精透”洋务的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他被派遣为中国第一任驻西方的出使大臣,先任驻英公使,继而兼任驻法公使。在两年的出使期间,郭嵩焘不顾自己年迈体弱,在做好公使本职工作的同时,抽出大量时间对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教育、历史、文化乃至生活方式进行深入考察和认真思考,并且详细地记载在自己的日记之中。他向西方学习的实践和理论,不仅为后人留下了一位先进的中国人在 19 世纪 70 年代末期对中西文化进行深刻对比研究的宝贵思想资料,而且在当时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社会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也有力地推动了湖湘文化向近代的转换。

首先,郭嵩焘发扬湖南人那种“特别独立的根性”,即不怕艰险,不畏人言,敢为天下先的创造精神,与各种落后保守观念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大声疾呼、反复宣传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在近代中国倡导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人物中,郭嵩焘是遭受攻击和诽谤最多的一位。谭嗣同说过:“中国沿元、明之制,号十八行省,而湖南独以疾恶洋务名于地球。……然闻世之称精解洋务,又必曰湘阴郭筠先(嵩焘)侍郎,湘乡曾劼刚(纪泽)侍郎,虽西国亦云然。两侍郎可为湖南光矣,湖南人又丑诋焉,若是之名实之不相契也。”当郭嵩焘被朝廷任命为出使大臣时,湖南有人编了一付对联,攻击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当他的赴英途中所记日记《使西纪程》被同文馆刊刻出版后,朝廷有御史大臣参劾他“有二心于英国”,其副使刘锡鸿则公开攻击他为“汉奸”。面对这种种攻击和诽谤,郭嵩焘将个人毁誉置之度外,坚持不懈地向人们进行西学启蒙。当他从英国回国不久,一友人劝他“见人不谈洋务”,他回答说:“吾谓并不见人,

然固不可不谈洋务。所以谈者，欲使人稍知其节要，以保国有余。……夫惟其知也，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于区区世俗之毁誉奚校哉！由此可见，正是由于强烈的爱国主义责任感，把郭嵩焘推到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线。

其次，郭嵩焘以敏锐的目光，最早认识到学习西方，须辨本末。早在 1875 年，当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口号刚刚形成不久，郭嵩焘就运用王夫之‘体用统一’的思想，明确指出：“嵩焘窃谓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未中之一节也。”郭嵩焘的本末论的内涵很丰富，既包括‘以通商为本’，即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又包括“以政教为本”，即要求进行政治上的改革；还包括‘以人心风俗为本’，即要求改良落后的人心风俗。郭嵩焘的这种本末论，使他的思想有别于洋务派，从而步入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范畴，并且直接影响到了谭嗣同、梁启超等人。

第三，郭嵩焘作为中国第一位驻西方国家的公使，不仅奠定了中国驻外使馆的基本操作规程，而且更重要的是提出了一套新的外交原则。面对与西方国家打交道的新的外交格局，郭嵩焘认识到不能再以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辨”的观点对待西方国家。因此他反复批评那些“尊王室、攘夷狄”的观点，认为外交工作不等于战争，它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他企图立足于国家长远利益确定对外方针，为国家稳定创造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他提出的一些外交原则，如‘知时审几’、‘以理制胜’、‘以礼相待’等，对于今天的外交工作，仍然是有参考价值的。

第四，郭嵩焘还以哲学家的深邃眼光，提出了向西方学习，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实事求是原本是个经学考据学的命题，到了近代才由曾国藩将它变成一个哲学认识论的命题。郭嵩焘的高明之处，就是通过对西方的认真考察，将这个命题与西方的科学精神结合起来，第一次明确指出：“西人格致之学，所以牢笼天

地,驱役万物,皆实事求是之效也。’不仅如此,他还强调中国向西方学习,也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1878年,他在从英国归国前不久,读了张焕纶的一个条陈后指出:张氏“于交接洋务未能尽其窾要,而于洋情为有得矣。然知洋情之为然,而不知测知中国之能行与否以求得其所以然,殆犹知彼而不能知己者也。其言蒙养书院章程,大致以西法佐中法,而实不外古人实事求是之意。实事求是,西洋之本也。”郭嵩焘在这里提出的学习西方必须知己知彼的思想是十分深刻的。所谓‘知彼’,就是要懂得洋情是什么,所谓“知己”,就是要懂得西方的东西能否在中国行得通。中国近代以来向西方学习的历史表明,相对来说,‘知彼’还比较容易,只要虚心体察外国的情况即可,而‘知己’则非常困难,全盘西化派和教条主义者就是明于‘知彼’暗于‘知己’。‘知己’之所以难,就难在需要‘测知中国之能行与否以求得其所以然’,这里不仅要于‘交接’之处‘尽其窾要’,而且因为将‘西法’转化为‘中法’,需要经历一个吸收、消化的过程。郭嵩焘在中国刚开始向西方学习的起步阶段,就能认识到这一点,不能不说是一种远见卓识。他对实事求是的这种理解,促进了这个古老命题向现代的转换,为毛泽东后来对它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作了必要的历史铺垫。

以上我们仅从郭嵩焘对待西方国家和西学的态度,进行了一些初步分析就可以看出,他的这些思想中的确有很多合理的成分,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和借鉴。

郭嵩焘在湖南近代是一位著述丰富的思想家,他的著作涉及经、史、子、集四部,包罗广泛的学术领域,是一个有待进一步开掘的丰富矿藏。但他在历史上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改革开放以来,郭嵩焘的著作才得以较多的出版,对他的研究也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热点。这既是学术界历史观进步的结果,也是改革开放的时代使然。为了推进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既要认真研究和总结当前实践的经验教训,也要认真研究和总结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以

来对外开放的经验教训。而对郭嵩焘的生平和思想的研究，是可以在这方面得到较多收获的。所以我们认为，这次郭嵩焘生平与思想研讨会的召开，是既有深刻的理论意义，也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长期以来，学术界在对郭嵩焘生平与思想的研究过程中，一直存在着某些观点的分歧，这完全是学术研究中的正常现象。这次研讨会，也将本着我们党一贯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希望这些不同的意见，在讨论过程中得到进一步的展开和深化。“真理以比较而明，学术由竞争而进。”我们衷心希望，通过这次研讨会，将郭嵩焘的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为繁荣我国社会科学和湖湘文化的研究，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郭嵩焘的历史定位

田海林 宋淑玉

郭嵩焘生当晚清内忧外患交并之时,时人或目为“汉奸”,或赞为“百世之师”。百余年来,沧桑多变,因设定的品评标准不一,学术界对其历史评价自然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郭嵩焘是晚清史上的关键人物之一,对其褒贬誉毁,必须建立在还其历史本来面目的基础之上。考察其言行,研究其是非,理解其时代,认识其作用,对探寻中国近代化的轨迹,对资鉴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事业,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唯有如此,才能不致于使郭嵩焘生前“流传万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¹⁾的狂狷自命永无历史回音。

一、经世派的后劲

郭嵩焘是湖湘文化的近代产儿。湖湘文化,宋代以前茫然无甚可表。自宋代周敦颐出,岳麓书院形成,既穷理尽性以思辨,又通经致用以济世的湖湘文化,方才发轫雏成。明末清初,王船山才高学富,著述等身,因节清气傲而隐逸,迄近代才得光大于天下,堪称近代湖湘文化之酵母。清朝嘉道以降,由于历史风潮所激,湖湘士子拔地崛起,不仅于内经世致用走向全国,而且于外栴欧风、沐美雨,救亡、启蒙,从“开眼看世界”到“走向世界”。从陶澎、魏源等先驱始,大批湖湘士子冲破保守愚昧、强梁自私的传统状态,慨然卓立,以经营天下为志,他们“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之风气。”⁽²⁾这种文化的史局,使郭嵩焘自青少年起便深受湖湘经世致用传统的熏染。

郭嵩焘 19 岁就学于岳麓书院。岳麓书院乃湖湘文化之中心，自南宋朱熹、张栻之后，思想上的忠孝廉节、学风上的经世致用，相沿成习，深深影响了历代每一位来此朝圣就学者。岳麓书院门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一语成谶，到近代中国史上终于幸而中验了。清朝嘉道年间，士习不端，人才困乏，学风败坏，吏治衰恶，内忧而又遭外患侵逼，为澄清天下，有关心国计民生的经世派出道崛起，而经世派人物芸芸，籍隶湖湘者甚多，若以影响之广大深远论，必当首推魏源。魏源即出身于岳麓书院。魏源为学非汉非宋，实事求是，“以经术为治术”，代江苏布政使贺长龄辑录《皇朝经世文编》，集有清以来经世致用文章之大成，承前而启后，一旦刊行，“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³⁾，以至“数十年风行海内”⁽⁴⁾。与魏源同调者，如汤鹏、贺长龄、贺熙龄、王文清、罗典、欧阳厚均、丁善庆、邓显鹤、唐鉴等人，尽管他们在学术流派上未必划一，但均注意于经邦济世，都是湘籍经世派大家族成员。这一流人物相与往还，以乡为党，关心时务国事，深究天下利病，对清朝的漕运、河务、盐政、科举、官制、赋役、钱币、兵丁、边舆以及道德、风习、学术等，都提出了查漏补缺性的建言，使以岳麓书院为中心的湖湘大地成了经世派的大本营。在这种特定的学术地理氛围之中，郭嵩焘通过在岳麓书院读经观史，耳濡目染，产生并形成了“保邦制国”⁽⁵⁾的经世思想。

在自汉迄清儒学统治的“经学时代”，《大学》中倡导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八条目”的文化哲学，一直是历代士子“内圣外王”的价值取向。郭嵩焘寄身于儒家思想文化堡垒的岳麓书院学习，这种积极入世的观念，自然会成为其崇高的心理祈求。受湖湘经世派的精神关照与文化影响，一方面，郭嵩焘极其重视对前辈乡贤经世思想的传承，广泛披阅鸦片战争时期的经世著作，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等。郭氏虽未见过魏源，但对这位经世派巨子深为服膺，在研读《海国图

志》后评道：“益精且博矣 魏氏此书征引浩繁，亦间有参差失实，要其大旨在考览形势，通知洋情，以为应敌制胜之资。”⁽⁶⁾对经世派其他人物的时论专著，郭氏亦多有评点或读校。另一方面，郭嵩焘与经世派人物亦时相过从，他曾与龚自珍、魏源都十分钦敬的今文经学大师宋翔凤论学，“久坐畅叙”⁽⁷⁾；曾与舆地学名家何秋涛讨论何著《朔方备乘》一书，该书对中俄边疆舆地考辨精审，为经世派研治西北边疆舆地的代表作。在郭氏生平思想中，其关注域外海疆塞防，且虽宗宋学而又尚‘经世致用’的今文经学，显然与继承林则徐、魏源、龚自珍、何秋涛以及宋翔凤等经世派人物的文化传统大有关系。

在鸦片战争时期，郭嵩焘对禁烟、河务、漕运、钱粮、刑名、兵制、海防、饷役等关系国计民生的社稷大政，都有过值得重视的思想言论，与林则徐、魏源一样，走的也是由‘内圣’而‘外王’的儒士经世致用的思想道路。

经世派形成于清朝嘉道年间，是地主阶级阵营中富有政治活力的自救派，是他们自觉的思想与积极的活动，维系着天日已斜的封建王朝的照旧统治，当天漏日残之际，他们是一批洋溢着地主阶级统治自救本能的补天者。出于阶级的局限性，他们对农民起义的反政府态度必然是敌视的。林则徐、魏源、姚莹等参与过镇压农民起义，曾国藩、左宗棠作为林则徐、魏源等人经世事功的继承者，更是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刽子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烈焰几乎焚毁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大厦，是曾国藩、左宗棠等铁血人物挺身而出，为清王朝重新定鼎的，而曾国藩与左宗棠对清王朝之所以能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郭嵩焘是起了极重要作用的。郭嵩焘虽以一介书生之文弱，但尽输对清王朝之忠诚，审时度势，凭三寸不烂之舌，终于说服了丁忧守制的曾国藩夺情出山；仗二行伶俐之齿，竟然举荐了科甲未第的左宗棠得委重任。曾氏之“墨经从戎”，左氏之破格晋升，郭氏居有大功，三氏姻亲联盟，通家为国，

事实上纽系成了一个为清王朝砥柱中流的湘籍政治军事集团。当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方兴未艾之时,是郭嵩焘联络曾国藩、左宗棠等经世干才,组织起了一支由团练起家的湘军,替代腐败的八旗与绿营兵为清王朝解了肘腋之患,救了头燃之急。

与林则徐、魏源等经世派前辈一样,郭嵩焘从来都是急清王朝之所急的。湘军作为由团练起家的地方军队,特别是在清政府财政极为支绌的形势下,是不能靠皇粮维持的。为了湘军的饷银,郭嵩焘倡创了湖南厘金制。对此,他自称:“不复以仕宦为意,而于经营国计,保卫地方,无敢稍释于心,始终未一任事,而在湖南筹兵筹饷,一皆发端自鄙人。”曾文正公办理军务,终赖此三项(湘省厘捐及粤、淮盐厘)以济军食,而湖南亦恃此以为富强之基,支柱东南数省。”⁽⁸⁾这并非郭氏自夸之辞。厘金的高妙之处在于:“夫酒榷茶榷,其类繁,或有税或无税,或重或轻,其弊为甚,故不如厘金,视百货屯聚之处,笼而取之,为公而实。今天下之利一出于商贾,取之以厘计,至约也。所取于商贾者,为厘以二、三计……于商贾何害?然吏竟取之民,则足以致乱。取之商贾,而民安焉。”⁽⁹⁾郭嵩焘创办厘金制,固然因盘剥商贾阻碍了资本主义关系在中国的商品化发展,但却为湘军提供了可靠的经济保障。无饷不养兵,湘军筹饷成功,各地团练纷纷仿效。1854年之后,河南、江苏等地广泛推行厘金制,而且得到了清政府的正式批准。翌年,湘、鄂、川、皖、闽、新、奉等地都实施了厘金制度。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及以李鸿章为首的淮军,镇压了如火如荼的太平天国与捻军起义,而这两支铁血之旅都是靠厘捐养活的。郭嵩焘倡创厘捐,事实上等于起了为清王朝输血的作用。另外,为了与太平军争夺长江水面的控制权,郭嵩焘又展一筹,倡议设了湘军水师,湘军水陆夹击,终于成就了沦陷天京之功。由此可见,郭嵩焘虽然被曾国藩认为“非繁剧之才”,但却运筹帷幄,妙计叠献,为镇压农民起义而扮演了摇羽毛扇的军师角色。郭嵩焘之筹厘金、创水师,与林则徐、魏源等经世前

辈的事功相比较,无论在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上,都是同具为清政府服务性质的。

通经致用,由中学而涉西学,这是经世派的一个重要特点,魏源就是如所周知的典型代表。郭嵩焘在学术思想与政治实践上,走了一条几乎与魏源同样的道路。郭氏出身于岳麓书院,于经学尤长于治“礼”,有《礼记质疑》、《订正家礼》对《大学》及《中庸》颇有心得,有《大学中庸质疑》对“以三百五篇当谏书”的诗说亦不陌生,有《毛诗正义》。魏源是今文经学家、曾国藩是理学家,郭嵩焘远敬魏源而近追曾国藩,尽管他不是个今文经学家,亦非理学家,更不像个汉学家,但坐以通经,起而致用,与魏源及曾国藩比,毫不逊色。魏源是既关注清朝国力强弱,又“开眼看世界”的人物,有《圣武记》与《海国图志》,郭嵩焘又何尝不是如此?郭嵩焘著有《绥边徵实》与《使西纪程》,他一样重视边防舆地,并且由“开眼看世界”而出使泰西,“走向世界”,在由中学而涉西学、向西方寻求真理的道路上,也是有着创榛辟莽、筚路蓝缕之功的。

正是从上述意义上,笔者认定郭嵩焘是魏源等经世派前辈的继承者,是经世派的后劲。

二、洋务派的智者

晚清时代,天下大变。郭嵩焘嵩目时艰,奔走呼号,处心积虑,苦行卓厉,以“内圣”之质,为“外王”之表,在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时期,既是清王朝干城,又是同侪群伦之主脑。洋务运动起,郭嵩焘又躬身先行,衷中参西,为富强之谋,展春云之彩,高论累呈,成了洋务派的智者。

郭嵩焘是颇能代表鸦片战争之后晚清历史进程的人物,他由经世派自然成为农民运动的镇压者,像林则徐;再为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之“中体”而兼采“西用”,由镇压农民运动的刽子手进化成洋务派,如曾国藩;至于其在思想文化上由“开眼看世界”而开步

“走向世界”，似魏源。

洋务运动是因内部镇压太平天国之需要，外部受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强烈刺激，为了替清王朝‘求富’‘求强’而在同光年间勃然兴起的。洋务派大致分两大势力：一是居廊庙之上的枢要人物，如奕訢、文祥等，一是处封疆之任的实力人物，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在同光年间，清王朝处于“古今未有之大变局”中，为了应对这种‘大变局’，朝野上下交哄，形成了一种在社会上带有普遍性的洋务思潮。在洋务论者之中，虽然都囿于“中体西用”的思想范式，但在维护‘中体’的动静态度上和吸纳‘西用’的宽窄界量上，又可以分为左右两翼，左翼如薛福成、冯桂芬、郑观应、马建忠、王韬、陈炽、陈虬等所谓早期改良主义者（或称早期维新派）之伦，右翼如上述之中央或地方官僚。左翼多在野；‘西用’色浓，右翼在朝；‘中体’味浓。郭嵩焘既被在朝者所青目，又为在野者所推崇；虽未亲自主持洋务实业，但却谙悉洋务情事；不仅内卫‘中体’，而且外采‘西用’，左右逢源，清标高道；一方面置身于洋务大潮之中，另一方面又超然地指陈洋务运动之陋弊，堪称是一位通时势、济世变，敢于放言高论的理论家。

从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这个‘中体’的政治思想路线上论，在洋务运动前期（1861～1866 年间），为了替清王朝解除内忧，平定农民起义，郭嵩焘不断出谋划策，据《郭嵩焘奏稿》（岳麓书社 1983 年版）统计，关于‘剿匪’内容的奏疏折片竟达近百种之多。郭嵩焘为清王朝荡平内乱之后，鉴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刺激，又开始接受西方侵略势力的挑战。从为清王朝谋求富强、兼采“西用”的文化观念上论，郭嵩焘识高一筹，呼吁创设了专门的外语学校，以求‘开眼看世界’，了解西方文化，做到知己知彼。早在 1859 年，他就曾上书条陈制御远夷之道，指出已与西方“通市二百余年，交兵议款又二十年，始终无一人通知夷情、熟悉其语言文字者”，这是夷人“无复顾忌”而我方屡战不胜的重要原因，他根据中西交通的历史

经验教训,认为“推考诸夷嗜好忌讳,以施控制之略”⁹;必务疏通其情¹⁰。咸丰皇帝看了奏折,感到有理,遂饬令王大臣议行,但由于清朝以来长期闭关政策与蒙昧主义的束缚,“而终无敢赞一词者”¹¹。但中西文化交流之门一旦被打开,是无法再重新关闭的。对学习外文洋语之事,虽然像倭仁那样的顽固的封建卫道士盈于朝野,但是三年之后,学习外文洋语的京师“同文馆”还是正式诞生了。郭嵩焘这一奏疏,可以说是晚清史上呼吁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的孤独先声。受洋务风潮的席卷,在京师“同文馆”的影响下,冯桂芬在上海也提出了与郭氏相似的建议,并被李鸿章采纳,1863年上海“广方言馆”得以成立。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冯桂芬与郭嵩焘是洋务至交,查《郭嵩焘日记》同治二年(1863年)条有:“拟同文书院章程十四条交黄荷汀。”可知上海“广方言馆”之章程系出自郭嵩焘之手。由此可以说,在洋务派人士中,郭嵩焘比那些只重视办工商实业者更高明些,他看重的是工商背后的科技,于是以办外文学校以发展文教事业为向西方寻求富强之道的入手之处。向西方学习,务求文化本源,郭嵩焘不愧是洋务派的智者。

在以“求富”“求强”相标榜的洋务事业中,郭嵩焘也比其他洋务派人士有着更为高瞻远瞩的文化理念。他认为,若欲“求强”,必先“求富”,反对洋务派的某些头面人物只注重盲目仿造坚船利炮。1875年,郭嵩焘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¹²“诚使竭中国之力,造一铁甲船及各兵船,布置海口,遂可以操中国之胜算,而杜海外之觊觎,亦何憚而不为之?而以西洋聚精会神擅强数十百年之术,强中国一日行之而遽责其抗衡,据一时之议以尽各海口之变,果足恃乎,果不足恃乎?此所不敢知也。”¹³显然,郭嵩焘看到了洋务军工企业一味追求仿造船器而不懂西方民主政治与文化教育是本末倒置,徒袭洋人之皮毛。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中国“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发展道路经历了

从船坚炮利,到工商科技,再到文化政教三个递进的层梯,郭嵩焘超越了第一个船坚炮利的层梯,站在第二个工商科技的层梯上,并且已经抬望到了第三个文化政教的层梯。他出使泰西,“走向世界”后,一旦目睹西方强盛之状,马上致函李鸿章:“令李丹崖携带出洋之官学生改习相度炼铁及炼冶诸法,及兴修铁路及电学,以求实用。”⁽¹⁴⁾洋务运动后来由‘求强’转向‘求富’,由军工企业发展到民用企业,郭嵩焘是起了某种重要理论指导作用的。

外交是洋务运动之中的应有大项,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腐朽的清政府与西方列强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西强中弱成了客观存在的外交格局。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格局下,在清政府中秉钧执要的洋务派把长于幕后理论点化的郭嵩焘推到了外交活动的前台,使之变成了弱国外交路线的理论家兼执行者。洋务派的外交总路线不外‘和戎’二字,以期通过折冲樽俎,修周旋之好,来求得夹缝中的苟延残喘。对此,郭嵩焘在外交思想上落实为“循理”二字。作为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大员的至交和代理人,郭嵩焘确定信奉他们‘忠信笃敬’的‘羁縻’外交方略,总想通过‘和戎’来维护‘和局’,以便韬光养晦。对此,郭嵩焘是通过理、势、情三字来把握的,他认为:“知情与势,而后有以处人,猜疑之见自不生于其心,知理而后有以自处,即矜张无实之言亦不屑出于其口。是以办理洋务非有他长也,言忠信、行笃敬以立其礼,深求古今之变、熟察中外之宜以致其用,轻重缓急,权度在心,随事折衷,使就绳尺。”⁽¹⁵⁾这段话既散发着迂腐,又透露着自信,不仅表现着无奈,也象征着从容,办理弱国外交,不得不‘据理力争’,但也只能是勉强求和而已,这是历史矛盾的文化折射。郭嵩焘是因办理‘马嘉理事件’而出国的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出使泰西,空前幕后,子身远使,困难重重。但他以正直的爱国心和高超的外交言行,不辱使命,为清政府在外交上“据理力争”,在国际上赢得了高度评价。观其言而察其行,知其实而论其人,在洋务派群伦之中,郭嵩焘不失为一位

难得的爱国者。

郭嵩焘‘精通夷务’⁽¹⁶⁾，被洋务论者推许为‘第一流’人才，一生并未直接举办洋务实业，只是署理过三年广东巡抚和担任过两年驻英公使(后兼驻法公使)，但他谙熟洋务事宜，思想敏锐，洞察力强，勇于建言，是独树一帜、名噪一时的洋务理论家。李鸿章说他“虽有呆气，而洋务确有见地”⁽¹⁷⁾。“所论利害，皆洞入精微，事后无不征验”⁽¹⁸⁾。可见郭嵩焘在当时就是被视为洋务派的智者的。

三、维新派的先驱

从政治属性上看，郭嵩焘是洋务论者的右翼，如曾、李之流亚；从思想表象上看，郭嵩焘又似洋务论者的左翼，近乎冯桂芬、薛福成、郑观应、王韬乃至严复之伦序。

由于郭嵩焘没有亲自涉身于洋务实业，更因为其对外方有着较同辈人显然深湛的认识，自始至终，郭嵩焘都是以洋务运动的理论批评家的身姿见世的。当然，其批评是洋务派内部的批评，有小骂大帮忙之嫌，但亦惟如斯，其批评方显得切中肯綮。一旦这种批评的激烈程度上升到超过维护封建的“中体”界线时，便自然会生出一种与正统的洋务派离心离德的文化倾向，并自觉或不自觉地向早期维新派的阵营靠拢，成为戊戌维新派的先驱。

郭嵩焘对李鸿章、沈葆楨、左宗棠等人的洋务活动时有所微词，常存不满。他批评李鸿章之师夷只重军事而忽视政教，曾言：“观其勤勤之意，是为能留意富强者，而要之皆末也，无当于本计。”⁽¹⁹⁾又称：“其徒考求洋人末务而忘其本也。”⁽²⁰⁾郭嵩焘出使西方，眼界大开，思想大进，回国之后，对清王朝自鸦片战争以来学习西方之不得要领痛心疾首，哀叹：“要知四十年来处置洋人源流，本末俱失，至是已无可补救。”⁽²¹⁾郭嵩焘作为驻英法公使，在西方生活过数年，以其绝顶之聪明，对西方列强之本末为何物，应是心知肚明

的。但他既为清王朝的钦差公使，又与曾国藩、李鸿章等封建大官僚交往至深，更由于阶级本性的局限，这就决定他在论西方富强之“本末”时，只能是点到为止，欲言又止。对于西方富强在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这个“本”，郭嵩焘虽然未点破说透，但是这绝不等于他未看破想透。

郭嵩焘在经济思想上主张寓强于富，富强相因，并认为欲令国强必先使民富，大有藏富于民之意。他主张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曾上疏称：“当师洋人之所利以利民，其法在令沿海商人广开机器局。”商人沿海办厂有益者三：一是可因商富而使国家受益；二是可利用制造与贸易来考察洋情和加强海防；三是民办商业与洋人贸易若生矛盾，较官办企业与外商发生冲突更易解决。而官办企业弊病还在于“使官专其事而烦费日甚，库款之支发日穷。”⁽²²⁾ 1889年，郭嵩焘又以铁路为例，说明其官办不如商办主张：“今殚国家之利，兴修铁路，所治不过一路，所经营不过一二千里，而计所核销之数，视所用数常相百也。是其意将以为利也，而但见其费，未睹其利。又一切行以官法，有所费则国家承之，得利则归中饱，积久无所为利焉而费滋烦，于是乎心倦而力气益馁。”⁽²³⁾ 郭嵩焘一贯主张发展民办工商业，反对开矿、设厂、筑路等企业概由政府插手包办，他说：“天地自然之利，百姓皆能经营，不必官为督率。若径由官开采，则将强夺民业，烦扰百端，百姓岂能顺从？”⁽²⁴⁾ 对借国家之名以夺百姓之利者，他明确指出：“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抑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²⁵⁾ 这些提倡发展民间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主张，的确是历史性的远见卓识，对中国经济的近代化，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这些经济思想主张，与早期维新派的代表人物王韬提出“恃商为国本”；“商富即国富”⁽²⁶⁾ 的观点何其相似乃尔！这是完全符合早期维新派的“工商立国”思想特质的。

在中西文化观念上，郭嵩焘虽然立本于“中体”，但对“西用”却

见解远高同辈。其《使西纪程》中对西学有许多赞美之辞，颇不似固守传统‘夷夏之辨’观念的冬烘面孔。他称：“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²⁷⁾“西洋以智力相胜，垂二千年。麦西、罗马、麦加迭为盛衰，而建国如故。……而西洋立国自有本末，诚得其道，则相辅以致富强，由此而保国千年可也。不得其道，其祸亦反是。”⁽²⁸⁾郭氏虽未对其西学本末观展开论述，但却不厌地一再强调西学自有本末，其良苦用心之所在，就是在对洋务运动“中体西用”范式的一种特殊批判，指桑所以骂槐者也。

郭嵩焘出使泰西，不仅在实践上打开了中国外交近代化之门，而且延扩了晚清时代国人从‘开眼看世界’到‘走向世界’的度量。他的《使西纪程》作为必呈的公文寄到清廷的总理衙门后，仿佛一石击破水中天，立刻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以至封建卫道士们口诛笔伐，必欲作为异端叛逆处置而后快，就连其湘籍同乡王闿运亦叹其“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²⁹⁾。郭嵩焘因此几招废使之辱。

其实，真正能反映郭嵩焘中西文化观念深层见解的文字在其使英日记中。郭嵩焘在伦敦时，常到英国议院旁听，心得颇深。他写道：“计英国之强，始自国朝，考求学问，以为富强之基，亦在明季，后于法兰西、日耳曼诸国。创立机器，备物制用，实在乾隆以后。其初国政亦甚乖乱。推原其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设买阿尔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敝。人才学问相承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而巴力门君民争政，互相残杀，数百年久而后定，买阿尔独相安无事。亦可知为君者之欲易逞而难戢，而小民之情难拂而易安也。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能辨此者鲜矣！”⁽³⁰⁾这不啻是石破天惊之论！郭嵩焘通过考察英国的“巴力门”(Parliament, 议会)和“买阿尔”(Mayor, 民选市长)，并与中国自秦汉以来二千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相比较，终于表达了自己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向往。

不能至,心向往之。对西方民主政治作如是观,我们还能将其摈斥于政治思想上以主张‘君民共主’为特征的早期维新派之外吗?

以社会交游而言,郭嵩焘与早期维新派也过往甚密。他曾两次与王韬晤谈,并得王韬以《瀛壖杂志》及《弢园尺牍》相赠。1876年,他保荐过薛福成,称其为‘有用之材’;可以办理洋务^{〔31〕}。郭乃曾国藩之高参,薛为曾门高足,两人在外交思想上及文化观念上多有相似之处,薛还利用陛见机会向光绪皇帝推荐过郭的《使西纪程》,郭对薛氏此举颇有知己之感,日后光绪皇帝能倾心变法,亦是渊源有自。郭氏代冯桂芬拟过上海“广方言馆”章程,已如上述。郭氏在驻使英伦期间,与当时留学的严复亦甚投机,其相与‘分析中西学术政治之异同,往往日夜不休’^{〔32〕}。严复在郭氏逝世数年之后即一跃而成为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与其在英国留学时受郭氏之影响也是有渊源关系的。

郭嵩焘既有对洋务运动,甚至对中国社会腐朽落后的严厉而深刻的批评,更不乏对西方社会及文化的品鉴欣赏,这实际上也恰好是其不见容于当时颀颀而阒隍之世、但却被后世维新派推重的原因,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我们认为称其为维新派的先驱,并非溢谀之辞。

从经世派的后劲,到洋务派的智者,直至维新派的先驱,这即是生于 1818 年而卒于 1891 年的郭嵩焘在晚清时代与时俱进、与世同因的生平大要与思想历程。历史时势使其然,世界潮流使其然,阶级属性使其然。其思想的逻辑轨迹因此,其思想的矛盾与进化亦因于此。郭嵩焘上承经世派,下启维新派,是洋务派中形右而实左的思想家,是晚清时代中国社会近代化发展史上对内求改革、对外求开放的代表人物,是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行者之一。

郭嵩焘地下之灵若有知,亦必以拙文之定位为实事求是之论。

(作者单位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